

元稹与禅宗论略

刘 铁 峰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湖南 娄底 417000)

[摘 要] 在中唐士人普遍尚佛的大环境下,元稹与禅宗也有着较密切的关系。他好游禅寺、广交禅僧、感悟禅理、寓禅于诗、以禅悟感发来观照社会与人生。特别是在调适贬谪心态与谪居情绪的过程中,在调整自己生命价值取向时,禅宗对他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关键词] 唐代文学; 唐诗; 元稹; 贬谪; 禅宗

[中图分类号] I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09)05-0073-04

在元稹生活的中唐时代,参禅奉佛,是当时一项重要的活动内容。“中唐士人普遍信佛,他们的成长、学习、生活都与佛教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或多或少地都有与僧人酬唱的诗篇和为僧人撰写的碑铭、僧赞、经序等文章,其文学创作不同程度地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1]“中唐的僧侣们,不过是披着袈裟的诗人,有些文人外服儒风、内修梵行。”^[2]元稹也是一位与禅宗渊源较深,深受禅宗思想影响的仕宦文人,白居易就曾以“身委《逍遥篇》,心付《头陀经》”(白居易《和答诗十首》)评价其人生。但是,前人研究元稹时,很少关注他与禅宗的关系。本文拟从两个方面,对此做一简要探讨。

一 元稹涉禅活动及对禅宗的知解

“元稹很早即接触佛教。”^[3]虽然,元稹自己并没有谈到过他何时接触佛禅,但根据他“况我早师佛,屋宅此身形”(《续遣病》)的自述来看,元稹接触佛禅应该在他入仕之前。如他在《答姨兄胡灵之见寄五十韵并序》中回想少年时代的游乐生活云:“九岁解赋诗,饮酒至斗余乃醉,时方倚舅族。舅怜,不以礼数俭,故得与姨兄胡灵之之輩为昼夜游。”而他们游玩的一项内容就是“尽日听僧讲,通宵咏月明。”^[4]^[5]据元稹十六岁寓居西京开元观(清都观)时所作的《清都夜景》、《秋夕怀远》等七首诗来看,青年时代的元稹不仅较早地接触到了禅宗,而且对禅宗的义理,也有初步的知解。如七首之一的《与杨十二李三早入永寿寺看牡丹》云:“色见尽浮荣,希君了真性”,颇有一种因色悟空,直了真性的佛禅意味,而据元稹《清都夜境》的自注,此诗为元稹“十六至十八岁时诗。”^[4]^[49]元稹在作于入仕之前的《象人》也称:“被色空成象,观空色异真。自悲人是假,那复假为人。”它同样表达

了一种佛禅感悟启示下的人生观。因此说,元稹在青少年时代就接触了佛禅,并受到了佛禅思想的影响,应该是可信的。到元稹走上仕途之后,特别是在他贬谪江陵、通州期间,他的涉禅活动,诸如与寺庙僧侣的交游等就更主动和广泛了,对禅宗思想的感悟也更主动和深入,这在他的诗歌中有明确表现。当然,“与禅师们的交往酬唱,参禅悟道,是唐代文人的时尚。”^[5]从现存的元稹诗作来看,他在入仕之前虽然在诗作中已有佛禅语和佛禅味,但硬要说他此时对佛禅有很独到的见解或很自觉的感悟,恐怕也言过其实,果真如此,他就不会对入世理想与功利追求那么坚定而执著了。他此时或许是自己真的对佛禅有了一些见解,或者是受世风影响,他开始接触到了佛禅,这在中唐时代也是一件很平常的事。

从佛禅对唐人的影响来看,“唐代诗人之佛教因缘,在诗作中最明显的呈现,大抵是游览僧寺和交往僧人两端。”^[6]元稹也是如此。他在任秘书省校书郎期间,常与白居易听庾七玄师讲经。白居易《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有云:“儒风爱敦质,佛理尚玄师。”在贞元二十年,元稹于“二月三日春社,至华岳寺,憩寥师院,未曾踰月,又复徂东,再谒寥师”(《华岳寺并序》);同年,元稹在洛阳结识了弃武入佛门的智度师(《智度师二首》)和志坚和尚(《志坚师》);元和四年元稹奉旨出使东川时,在梓州结识了清闲上人;在谪居江陵时,常与诗僧如展禅师往来唱和,他与如展唱和的诗作至今仍有三首留存;元和九年,元稹在潭州结识了卢头上人,并作诗《卢头陀诗并序》和《醉别卢头陀》为记;元和十二年在司马通州时,又结识了智藏诗等人。从元稹诗文来看,在当时与他交往的僧人还有:昙上人、寂上人、嵩上人、如寂上人、白寂然等。如果元稹当时的作品都能保存下来,这个僧人名单可能

[收稿日期] 2009-08-21

[基金项目] 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课题资助(编号:0606018A)、湖南人文科技学院青年课题资助(编号:2007qn13)

[作者简介] 刘铁峰(1968-),男,湖南新化人,湖南人文科技学院教授。

还要延长。

元稹与禅僧交游,并不局限于一门一派。例如这其中的志坚和尚,“他是普寂的弟子。而根据《楞伽师资记》,普寂禅师修行于洛阳嵩高山,是北宗第八代禅师,乃大通神秀和尚之后。”^[1]而那个清闲上人,据白居易《赠僧五首·清闲上人》自注所说,他“自蜀入洛,于长寿寺说法度人。”他是神照的弟子,而神照却是南宗神会一系。这种与禅门僧寺不分门派广泛交往的记载,也大量出现在元稹的诗作中。如:“遐思玉泉寺,久闻岷山亭”(《思归乐》)、“闲行曲江岸,便宿慈恩寺”(《与吴十一兄端公崔二十二院长思忆曩游因投五十韵》)、“北祖三禅寺,西山万树松”(《度门寺》)、“现身千佛国,护世四王军”(《大云寺二十韵》)、“梁王开佛庙,云构岁时遥”(《和友封题开善寺十韵》)、“乘兴无羁束,闲行信马蹄”(《消卢戡与予数约游三寺戡独沉醉而不归》)、“南堤衰柳意,西寺晚钟声”(《遣行十首》)、“羞见寰师无外役,竹窗依旧老身闲”(《华狱寺》)、“春来日日到西林,飞锡经行不可寻”(《寻西明寺僧不在》),此外还有《漫天岭赠僧》、《华岳寺雪后望山》、《雪后宿后同轨店上法护寺钟楼望月》等等。

从元稹对禅宗思想的感悟与其人生反应来看,南宗禅对他的影响可能更为明显。元稹所处的中唐时代,正是马祖道一禅派——洪州禅兴盛的时期。道一禅学是建立在《楞伽经》、《金刚经》、《般若经》和《维摩经》等禅宗经典与老庄思想相交融的基础之上的,它有一个著名的观点,即“平常心是道”。《马祖道一禅师语录》云:“道不用修,但莫污染。何为污染?但有生死心,造作趋向,皆是污染。若欲直会其道,平常心是道。何谓平常心?无造作,无取舍,无断常,无凡无圣。经云:非凡夫行,非圣贤行,是菩萨行。只如今行住坐卧,应机接物,尽是道。”它主张人们不要过分执著自我,不要过分在意身外的得失,要以一种无执、无我、无相、无物的超然态度,顺应社会与人生,在一种平常自然的心态观照下,随缘尽化,调适自我。它与佛家普遍认同的“空”“无”观点,有本质相通之处。它对唐代士人的日常生活方式,尤其是对宽解士人的精神重负与心境重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为那些在仕途中陷入困顿与茫然的人们,提供了一种理想化的生活状态与心灵家园模式。如中唐诗人李翱《赠药山高僧惟俨二首·一》云:“炼得身形似鹤形,千株松下两函经。我来问道无余说,云在青天水在瓶。”好一个“云在青天水在瓶”,这简直就是一种委运乘化、万物融和的禅化境界,与王维在《终南别业》中所说的“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有异曲同工之妙,人身心之外的所有附着,在此都被云水般的任意自然消化解脱得干干净净了。当然,要达到这种境界,必须以对禅的感悟知解的程度为前提。因为,“禅宗就是觉悟的修行。”^[7]没有对禅宗的知解觉悟,也就难以以禅宗指导自己的人生。在唐代,“文人礼佛与方外僧徒过往频繁,诗作中多涉禅语、用禅典、示禅机、以禅入诗,进而以禅喻诗等。”^[8]虽然,有些“禅喻诗的作品,本身并不谈禅论佛,主旨也不在表现理趣,而是在对自然景物或人的心境的描绘表现之中或之处,寓有禅意”^[8]但可以肯定地说,它们也反映了诗人对禅宗的觉悟与知解程度。在元稹的作品中,我们也不

难看到他的禅观表示,并由此而可以觉察到他对禅宗思想的知解程度。

在元稹早年寓居长安时,在他的诗歌中就流露出一种似水流年般的人生感悟:“满眼流光随日度,今朝花落更纷纷”(《与吴侍御春游》)、“时节催年春不住,武陵花谢忆诸郎”(《清都春寄胡三吴十一》)。在这种事物盛衰消长、生命轮回不息的直接感受中,表现出一种亦佛亦道的哲学思辨色彩。禅宗主张的平常心是道、无执无我的空观导向,对于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所遭遇的人事代谢,迷幻而虚无的现实困惑,具有较直接的消解劝悟功效。因此,元稹以禅宗的色空之说观照世事,所谓“色见即浮荣,希君了真性”(《与杨十二李三早入永寿寺看牡丹》)、“门前本是虚空界,何事栽花误世人”(《杏园》)。在元稹看来,世间万相,相(存在)乃幻觉,不论是牡丹、是杏花还是别的其它事物,它们都只是昙花一现的存在,在这短暂的出现之后,便是永恒的虚空无有。因此,当人民以无执无念、不妄不变之心来体察和感知到这种空与实的关系本质时,也就是明白了天地自然的实质本真,这便是“真性”所在。正如《金刚经》所说的:“凡有所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9]元稹说的“不是眼前无外物,不关心事不经心”(《赠乐天》)就是从佛禅空无观出发,追求心外无物,以求心性发现的理念探求。在元稹谪居江陵时期,历经丧妻之痛和贬谪之苦的他,在坚持以儒道济世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向佛禅中寻求心性的自我宽释与解脱,就如他在《思归乐》中所说的:“闲穷四声韵,闷阅九部经。身外皆委顺,眼前随所营。此意久已定,谁能求苟荣。”在困顿的现实生活启示下,元稹比往常更能感悟禅宗所说的本空无有的内在意义,在他漫长而苦闷的谪居生活中,他感叹道:“结念心所期,返如禅顿悟。觉来八九年,不像花回顾。浮生转经历,道性尤坚固”(《梦游春七十韵》)。因感悟现实生命的空无而寻求悟道,希望在道的启示之下来思辨现实和生命解救,这道,与他在《离思五首》中所说的“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有内在相通之处。因此有论者认为“这里的‘道’,指的不是道教,而是佛教。”^[10]“从‘返如禅顿悟’这句,可推知元稹参的是佛教的南宗禅。”^[10]

其实,元稹所参悟的是南宗禅还是北宗禅,并非问题的关键,关键的是,元稹对禅知解觉悟程度,以及在禅观启示之下,他对社会人生的感观表达和心态情绪表现。白居易在写给元稹的《和梦游春诗一百韵·序》中说:“况与足下外服儒风、内宗梵行者有日矣。而今而后,非觉路之返也,非空门之归也,将安返乎?将安归乎?……欲使曲尽其妄,周知其非,然后返乎真,归乎实。亦犹《法华经》序火宅、偈化城,《维摩经》入淫舍、过酒肆之义也。”^[11]这则诗序提供了关于元稹内心真实世界的宝贵材料,可视为他以佛学思辨来感悟人生的证据。元稹在谪居期间的诗歌中,常常表达出一种功名理想,如梦如幻的认识倾向,在似水年华的老大之叹中,表现出一种年景不再,流光已逝,欲向空门求,空空无所有的禅悟味道,与南宗禅“自性自悟,顿悟顿修”^[12]的主张相契合。如元稹《酬宴校书二十韵》云:“但喜添樽满,谁忧乏桂然。渐轻身外役,浑证酒中禅。”如此快意自我,似乎人生的无限妙趣,

尽在酒中,俨然一种“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的淡化超然。他在《饮致用神曲酒三十韵》等诗中,也有与此相同的禅化情韵的蕴含与表达。

当然,从本质上说,元稹的功利之心,远比他对他佛禅义理的知解要自觉和执著,这使得他对佛禅的感悟知解也达不到白居易、王维那样的通脱自觉。但在现实的挫折面前,或者说他在连续的仕途沉浮影响之下,使他的人生思想与生命价值取向,很明显参进了禅宗的思想因子。如其《悟禅三首寄胡果》云:“晚岁倦为学,闲心易到禅”。《酬窦校书二十韵》云:“渐轻身外役,浑证饮中禅”,甚至还以“近来逢酒便高歌”(《放言五首·一》)来自放与自适,这都说明了他对禅宗义理是有一定的知解感悟并在事实也接受了禅宗影响的。

二 禅宗对元稹贬谪骚怨情感的消释与启示作用

“禅宗之所以受到中国人的欢迎,不仅因为它是中国化的佛教,而且是因为它为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提供了一整套非常有效的疗心方式,这种以修禅来化解心理问题的方式,简单易行,风格高尚,超越物我。”^[13]如果说元稹专意修禅,似乎有点勉强,但元稹在中唐习禅世风的影响之下,在对人生意义与谪居命运的反思与应对上,禅宗对他痛苦心态的宽释与骚怨情绪的化解作用是明显的。

元稹心中有一个难解的结,那就是对功利的追求。元稹自德宗贞元九年授官左拾遗以来,终其一生,皆投身仕途。仕途中的元稹,“生性激烈,少柔多刚,参政意识和功名欲望甚强。屡屡上书论事,指谏时弊,或实地纠劾,惩治滑吏,也因此而多次遭遇贬谪。”^[14]贬谪,使元稹常常陷入灾难体验的痛苦之中。那种穷途绝路、沉沦僚倒、负屈含恨的悲恸感,常常流露在他的诗文中。例如:

“至于升朝,无朋友为臣吹嘘,无亲党为臣援庇,莫非苦已,实不因人……便至今日窜逐,臣自离京国,目断魂消”(《同州刺史献上表》);“雨滑危梁性命愁,差池一步一生休。黄泉便是通州郡,渐入深泥渐到州”(《酬乐天雨雨后见忆》);“秋茅处处流虐疟,夜鸟声声哭瘴云”(《酬乐天寄生衣》),“阴深山有瘴,湿垫草多虻。众噬锥刀毒,群飞风雨声”(《虻》);“羸骨不胜纤细物,欲将文服却还君”(《酬乐天寄生衣》);“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谪九江。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闻乐天授江州司马》)。

从他这“羸骨不胜纤细物”的形象自叙中,从他“垂死病中惊坐起”的情绪反应中,我们不难觉察蕴藏在元稹内心因贬谪造成的巨大痛苦与悲伤。也正因如此,《旧唐书》本传说“观其流离放逐之意,靡不凄惋。”^[15]

与所有被贬谪者一样,元稹“一方面,他背负着过去的包袱,往日的生活动夜陪伴着他;另一方面,他必须面对现实,适应新环境,他的生存取决于他解决这种两难选择的能力。”^[15]那么,元稹在其反复的谪居生涯中,又是怎样来消解骚怨,调适自我,解决他贬谪情境下生存的两难选择的呢?

白居易在《和微之诗二十三首·和知非》中,曾建议元稹用禅宗思想来缓解仕途落拓沉沦的痛苦,说“因君知非问,论较天下事。第一莫若禅,第二无如醉。禅能泯人我,醉可忘荣粹。劝君虽老大,逢酒莫回避。不然即学禅,两途

同一致”。从元稹谪居期间的情感反应来看,他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白居易的建议,开始有限地从先前执著的功利立场上向关注现状、调适自我的禅观立场偏移。即在对生命现实状态的自我省视中,借助于禅宗思想的空净无有,来自觉消解对功利的执著与粘滞,尝试着以一种随遇而安的心态导向来调适失落之心,这在他不同的贬谪时期,有各自不同的表现,但以谪居江陵和通州时期最为典型。

元和五年春,在出使东川期间取得了优异政绩的元稹,不但无功,反而以“失宪臣体”^[16]被贬江陵士曹参军。其心中失落与负屈感受,可以想知。因此,在他谪居江陵期间,人生短促、生命飘忽的现实感受与人生认知,成为他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内容。如:“身名判作梦,怀盍莫相违”(《酬友封话旧叙怀十二韵》)、“翳翳林上叶,不知秋暗生。回悲镜中发,华白三四茎”(《解秋十首·一》)、“往岁学仙侣,各在无所乡。云色日夜白,骄阳能几何?”(《解秋十首·四》)、“岂念百草死,但念霜满头。头白古所同,胡为坐烦忧。茫茫百年内,处身良未休”(《解秋十首·四》)、“华发不再青,劳生竟何补”(《遣病十首·二》)、“今来渐伟年,顿与前心别。白日速如飞,佳晨亦骚屑”(《遣病十首·三》)。

这种逝者如斯、镜花水月般的禅化感悟,启发元稹对生命本质的思考,也促使他从原有的儒道济世理念上退缩,转向关注自我,追求现实满足,注重个体感受。于是,一种立足眼前、淡化执著,抓住既有、享受今生的情绪,开始出现在他的诗文创作中。如“但喜添樽满,谁忧乏桂然。渐轻身外役,浑证酒中禅”(《酬窦校书二十韵》),就表达出了一种“酒肉穿肠过,佛主心中留”禅派风味。而在《饮致用神曲酒三十韵》中,“诗人于酒中见真性,发现酒中也别有洞天,于是无限情致与神思都诞生于刹那之间。”^[10]

在江陵期间,元稹与禅门交往比往常更加主动,在参禅悟道中,他检讨过去,反思自我,关注现在。佛禅思想,成为了他在此期间进行自我调适的有效良方。在《醉别卢头陀》中他说:“醉迷狂象别吾师,梦觉观空始自悲。尽日笙歌人散后,满江风雨独醒时。心超几地行无处,云到何天住有期。顿见佛光身上出,已蒙衣内缀摩尼。”在这里,既有禅者的觉悟,又具人之常情;既有空幻的苍凉,又有顿悟的超然。而这种基于对现实幻化认定下的超然,到元稹在谪居江陵的后期,表现得更加明显。如组诗《遣春十首》、《表夏十首》和《解秋十首》所表现的诗境与流露的情感,其悠然自适的淡泊与从容,就很难在他前期诗作中见到。又如《酬李甫见赠十首》(其六)云:“莫笑风尘满病颜,此生元在有无间。卷舒莲叶终难湿,去住云心一种闲。”好一个“此生元在有无间”、“去住云心一种闲”,这与王维的“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终南别业》)堪称同调。这种豁达闲适,好比庭前看花,宠辱不惊的情态表达,表现出了明显的禅悟导向。

元和十年三月,元稹被贬通州司马。当时的通州,环境恶劣,元稹初来此地,心中充满了惶恐绝望之感。所谓“黄泉便是通州郡,渐入深泥渐到州”(《酬乐天雨雨后见忆》)、“自怜才命俱困,恐不能复脱于通”(《上兴元权尚书启》)。但最终他还是在友人劝慰和佛法指引下,向禅悟中寻求启示,找到

了调适自我的方法。其《和乐天赠恒寂僧》云:“欲离烦恼三千界,不在禅门八万条。心火自生还自灭,云师无路与君销。”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南宗禅的“自度”说对他的影响。《坛经·第一·行由品》云:“迷时师度,悟了自度,度名虽一,用处不同。”在此,元稹似乎在告诉自己,在人的本性具足而又无法可得的时候,只有鉴明自己的心性,在佛禅般若智慧的启示下,把握人间万相本空无有的实质,才能真正平息内心因得失沉浮而引发的挫辱、苦痛与忧愁。因此,他在《酬知退》中写道:“终须修到无修处,闻尽声闻始不闻。莫著妄心销彼我,我心无我亦无君。”有即是无,无即是有,只要心境清静,自会通脱。所以,到了他谪居通州后期,关于谪居生活中凄苦之叹与惶恐之感的表达,与其先前相比,要轻缓了许多。一种随缘尽化、顺时而安的心态流露,成为了他此期诗歌的情感基调。如“以此方我病,我病何足惊?借如今日死,亦足了一生。……前身为过迹,来世即前程”(《续遣病》)、“饮罢醒余更惆怅,不如闲事不经心”(《和乐天仇家酒》)等等。一种看破世情、放逐功利、任意自我、随缘尽化的禅悟之情,蕴涵在心境与诗境中。与他在《遣病》组诗中对生命流逝、叹老嗟卑的幽幽之情相比,心境要轻松和空灵许多。

在谪官通州后,元稹又经历了两次贬谪,对人世沧桑的生命体验,又加深了许多。如他在诗中所表达的:“浮生未到无生地,暂到人间又一生。”(《哭小女降真》)“明朝又向江头别,月落潮平是去时。”(《重赠》)“犹应更有前途在,知向人间何处行。”(《寄乐天》)他早年那种因贬谪而产生的不平、悲怨、凄苦、孤寂、落拓之情,很少在他的诗文中表露,更多的是以一种务实的态度,或遗落自我,或心游禅境,大度而超然。例如,元稹在武昌任上时,就广结善缘,并以诗劝戒僧人云:“劝尔诸僧好护持,不须垂钓引青丝。云山莫厌看经坐,便是浮生得道时。”(《修龟山鱼池示众僧》)他把自己对佛旨的领会示于众僧,诗中充满了护生之意,慈悲之心。又如《游云门》云:“明月自随山影去,清风长送白云归。”诗歌宁静而淡定,表现出一种随缘任运,随遇而安的禅化意境。而元稹作于大和四年的《题法华山天衣寺》诗云:“马踏红尘古塞平,出门谁不为功名。到头争似栖禅客,林下无言过一生。”世间一切犹如虚空花,虚而不实,聚散无常,充满着入世与出世的矛盾,现实人生与精神世界不能统一的矛盾。欲求求得“真如”之境,佛法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最终的目的,所以它也在放弃之列。可见,此时的元稹在对生命本体意义的体认上又进了一层。

因此说,元稹受中唐禅风的影响,一方面游历禅寺,广交禅僧;一方面又接受禅宗影响,使自己在调适贬谪骚怨心态的过程中,不断走向消解与平和。禅宗思想,也因此成为了他调适自我贬谪骚怨心态的一剂良方。

[参考文献]

- [1] 张维民.论中唐士人的心理建构[J].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4(2).
- [2] 孙昌武.佛教与中国文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88.
- [3] 何剑平.元稹的宦海浮沉与禅心消长[J].四川大学学报,2005(1):72-78.
- [4] 元稹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2.
- [5] 刘人杰.中国文学史(二)[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9:278.
- [6] 张引驰.隋唐佛学与中国文化[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65.
- [7] 伍世文、李丽芸.禅之悟——略论禅宗的生存智慧[J].惠州学院学报,2006(5).
- [8] 都洁婷.论禅宗与中国古典诗歌的关系与影响——以唐代诗歌为考察中心[J].贵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6(4):35-36.
- [9] 钟明译注.金刚经·第五品[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24.
- [10] 赵缈缈.他生缘会此生休——试论元稹诗歌与佛教[J].长春工业大学学报,2005(3):67-69.
- [11] 顾学颉.白居易集(卷14)[M].北京:中华书局,1979:96.
- [12] 钟明译注.坛经·顿渐品第八[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165.
- [13] 李迎春.论禅诗的禅疗及其心理保健意义[J].河南教育学院学报,2005(4):126-128.
- [14]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2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338.
- [15] [美]Asher M ibauer.超越流亡[M].迈阿密·佛罗里达国际大学出版社,1985:133.
- [16] 傅璇琮.唐才子传校笺[M].北京:中华书局,2002:116.

On Yuanzhen and Zen

LIU Tie-feng

(Hunan university of Humanitie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oudi 417000,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great environment of widespread belief in Buddhism in Middle Tang Dynasty, Yuanzhen had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Zen too. He liked visiting the temples, kept company with monks as a group, comprehended the Zen theories, blended the Zen insight with poetry and treated the society and life with Zen insight. Particularly, Zen had effect on him obviously in adjusting attitude and mood toward banishment and regulating his own life value.

Key words The Literature of Tang Dynasty; The Poetry of Tang Dynasty; Yuanzhen; Banishment; Zen